

# 中国古代文学风貌与文学精神

李中华 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## 内容简介

从广阔的文化视野，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所呈现的文学风貌进行多层次、多角度的描述。

书名：中国古代文学风貌与文学精神

作者：李中华

出版社：湖北人民出版社

ISBN：7-216-04325-1/I 206. 2

出版日期：2005年7月

印张：13.875 开本：32

定价：32.00元

# 目 录

## 第一辑 学术思潮与文学风貌

汉魏学术思潮与建安文学的繁荣.....	3
魏晋名士文学的兴盛与衰落 .....	14
唐太宗的文艺观及诗歌创作初探 .....	37
李贺诗歌的艺术风格 .....	46
李商隐“无题诗”的情感寄蕴 .....	51
晚唐温李诗风评议 .....	66

## 第二辑 封建政治与文人遭遇

从“三曹七子”到“二十四友” ——试论魏晋文人集团与文学精神的演变 .....	85
“竹林聚散”的历史考察 .....	99
阮籍：人生苦闷的象征 .....	114
——试论《咏怀诗》中的生命意识及其文学表现	
南齐皇权纷争与谢朓之死.....	130
评唐玄宗朝“吏治与文学之争” ——兼论盛唐气象的形成及其历史意蕴.....	149
肃宗朝政局纷争与李杜的悲剧命运.....	165
李商隐与牛李党争.....	185
唐代贬官制度与不平之鸣.....	201
——试论开明专制下的文人遭遇与心声	

附:胡雪岩形象中的文化蕴涵 ..... 218

### 第三辑 宗教民俗与文学蕴涵

《楚辞》:宗教的沉思与求索 ..... 231  
先秦招魂习俗与《招魂》 ..... 244  
汉魏六朝文学中的道教境界 ..... 248  
论葛洪及其《抱朴子》 ..... 256  
李后主与“法眼宗” ..... 289  
融合 交汇 联姻  
——论宗教与通俗小说的文化联系 ..... 301

### 第四辑 文学观念与时代精神

赋心 诗心 词心 文心  
——古代文学理论中的心灵化阐释 ..... 321  
船山诗论中的艺术原则 ..... 330  
论王船山的文学精神 ..... 355  
王船山、顾亭林、黄梨洲文学观之异同 ..... 370  
王船山《诗经》学面面观 ..... 383

### 第五辑 文学体式与考证

“屈原赋二十五篇”辨说 ..... 399  
楚辞的文体界定与文体渗透 ..... 404  
《木兰诗》考证 ..... 408  
唐代七古、七言歌行辨体 ..... 419  
“长庆体”考辨 ..... 424



晚唐“三十六体”辨说.....	429
后 记 .....	437





## 汉魏学术思潮与 建安文学的繁荣

汉魏之际,在我国学术思想史上,是一个大转折时期。在此之前,它经历了以尊奉“六经”为标志的汉代经学;在它之后,开始了以崇尚“三玄”为特征的魏晋玄学。建安时代,正是这一学术思潮转折的枢纽与关键。学术思潮的转移对于一代文人的心理构成、价值观念都有着重要的影响。建安文人呼吸着时代的学术空气,形成了特殊的文化心理,从而影响着文学的内在精神及艺术风貌,促成了建安文学的繁荣与发展。

### 一、汉魏学术思潮转变之大势

汉代的学术思潮,自从汉武帝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以后,进入了经学极盛的时代。当时“上无异教,下无异学”,皇帝诏书、群臣奏议,莫不援引经义作为依据。连下层官员也多能推明经义,移易风化,号为“以经术饰吏事”。汉宣帝甘露三年,朝廷召集群儒,论定五经,皇帝亲临裁决,史称“石渠阁奏议”。汉章帝建初四年,朝廷又大会群臣、诸生于白虎观,考详五经同异,著为《白虎通

---

皮锡瑞:《经学历史》。

义》。汉灵帝熹平四年,又诏诸儒正定五经,刊于石碑,立在太学门外。这些旷世盛典,使得经学的势力笼罩全社会。

然而好景不长,经学极盛的局面在汉末大乱中迅速地崩溃了。探究经学衰落的原因,可以指出以下三条:第一,独尊儒术所造成的经学繁盛本是借助封建政治、尤其是皇权的提倡而出现的,它必然伴随封建政治的腐败、皇权的衰微而趋于没落。正如班固所说:汉武帝立五经博士,劝以官禄,尔后传业者愈盛,支叶繁滋,“盖禄利之路然也”。汉末宦官、外戚当权,朝政腐朽,经学被视为爵禄名利之途。学术文化成为封建皇权的附庸,学人失去了独立品格与创造精神,这种学术的没落便是必然的。第二,汉代儒术不同于孔孟的原始儒学,它与阴阳讖纬之说相糅合,带有宗教的性质。孔子不语怪、力、乱、神,而汉人解经,多涉怪异。丰富、活泼的儒家文化被歪曲,经生专事章句训诂,严守家法,成为“守文之儒”。儒家被定为一尊之后,它又失去与其他文化思想互相竞争、自我调节、发展完善的学术环境,因而停滞、僵化了。第三,汉末党锢之祸,“志士仁人,多填牢户。文人学士,亦捍文网”。大批优秀的儒家知识分子被监禁、杀戮或屈死狱中,更多的知识分子遭到长达数十年的禁锢,成了推动学术思想剧变的现实契因。

概括起来,从内部看,儒家所主张的仁义礼信的伦理原则和重视人道的积极精神被阉割,褪化为一种消磨、腐蚀文人心力的负累。解说一经,可以多至百余万言,“幼童而守一艺,白首而后能言”,学术文化成了人类精神的重负。从外部看,东汉王室的崩溃,使经学失去了依托。汉末学术思潮之不能不变,其原因即在于此。

---

班固:《汉书·儒林传赞》,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,第1040页。

皮锡瑞:《经学历史》。

班固:《汉书·艺文志》,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,第595页。

从东汉王充、王符、仲长统等人的论述中,已经可以感到学术思想转移的迹象。王充治学“始若诡异,终有理实”,与一般守文之儒全然不同。他认为“人不能以行感天,天亦不随而行而应人”。他说:“夫天道自然也,无为。如谴告人,是有为,非自然也。黄老之家论说天道,得其实矣。”王符则说:“鬼神与人殊气异务,非有事故,何奈于我?”仲长统性格倜傥,每当谈及古今时俗,就发愤叹息。他的言论更为直截大胆,说:“知天道而无人略者,是巫医卜祝之伍、下愚不齿之民也。信天道而背人略者,是昏乱迷惑之主、覆国亡家之臣也。”这些,向汉儒的“天人感应说”提出了挑战。

这种转变中的学术思想,初时犹如涓涓细流,随着汉末大乱而泛滥为时代的主潮。思想界挣脱了经学的束缚,而呈现多种学术文化并存、互相融合的局面。

儒学衰落了,但它的影响依然存在。一方面,对于封建政治文化的批判使人们将朝廷视为污秽之地。另一方面,儒家崇尚气节的人格精神却因党锢之祸的激厉而被发扬光大。史载李膺被拷死狱中,门生故吏遭禁锢,侍御史景毅上书朝廷,陈明与李膺的关系,自表免归。度辽将军皇甫规自以为是西州豪杰,以不得列名党人为耻,于是上表说自己曾荐张奂,是附从党人;太学生张凤等又曾为自己赴阙上书是为党人所附,所以应连坐受罚。党锢之祸中遭受迫害的张俭被朝廷追捕时,人们纷纷冒杀身破家之祸收留、保护。这些感人的事例,都表现着儒家崇尚气节、舍生取义的精神。同时,道家的兴起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思想倾向。道学本有排遣郁闷、调节精神的妙用,其超奇的艺术想象力尤为文人所喜爱。由

王充:《论衡·谴告》,人海人民出版社 1974,第 224 页。

王符:《潜夫论·卜列》,中华书局 1985,第 295 页。

见仲长统:《昌言》,严可均辑《全后汉文》卷八十九,中华书局 1958,第 955 页。

于时局维艰及儒家的没落,道家思想便弥漫于士人之间,表现为对生命的关注及神仙的向往。政治及军事斗争的需要,又使强调综核名实、赏罚必信的刑名之学应运而起。这里,各种学术思想的并存不是简单地互相排斥,而是互相制约又互为补充,成为一种新的综合体。

## 二、建安文人的文化心态

建安文人感受着同样的时代学术思潮,在文化心理上也呈现出若干共同或相通的特征。主要表现为三点,即开放的心态、建功立业的思想以及蕴涵着艺术情调的人生态度。

在学术思想上,建安文人采取了一种比较宽松的、兼容并包的态度。如前所述,儒学中迂腐繁琐、不切世务的部分被抛弃,而重人格、尚气节的儒家精神得到了继承与发扬。试以曹操为例。曹操年轻时曾上书为在党锢之祸中遇害的窦武、陈蕃鸣冤,言辞直切。建安八年,曹操又颁布《修学令》曰:“丧乱已来,十有五年,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,吾甚伤之。”他因此要求各郡国“修文学”、各县“置校官”,以使“先王之道不废,而有以益于天下”。在诗《善哉行》中,曹操歌颂古公亶父的“积德垂仁”、太伯仲雍的“王德之仁”,晏子平仲的“积德兼仁”,所赞美的人物及其语言都是儒家的。在《对酒》中,曹操描绘了自己的政治及社会理想:“王者贤且明,宰相股肱皆忠良。咸礼让,民无所争讼。三年耕有九年储,仓谷满盈。班白不负载”,“爵公侯伯子男,咸爱其民,以黜陟幽明,子养有若父与兄。犯礼法,轻重随其刑。路无拾遗之私,囹圄空虚,冬节不断。”诗中展现的,不就是一幅儒家的太平盛世图吗?道家思想对于曹操的影响,也是很明显的。他曾在诗中想象自己“驾六龙、

乘风而行,行四海外”,幻想与赤松子、王子乔、西王母诸仙人玉女交往翱游,得到长生不老的仙药。曹操还喜好道家养性之法,懂得各类方药,招引各地方术之士,无不毕至。曹操还受到墨家的影响。崇尚节俭、反对奢华,主张“兼爱尚同”,便都与墨子的主义相吻合。他又特好兵法,曾注孙武子十三篇,作兵书十余万言。至于尚法术,好刑名,更是曹操思想行事的一个重要特征。晋傅玄上武帝疏曰:“近者魏武好法术,而天下贵刑名。”又《文心雕龙·论说》曰:“魏之初霸,术兼名法,”便都是就此而言。

这种情况在曹丕、曹植身上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。曹丕称帝的第二年,即下诏颂美孔子:“屈己以存道,贬身以救世”,是“命世之大贤,亿载之师表”。在诗中亦说:“得人则安,失人则危”,“明德通灵,降福自天”,可见儒家的影响。曹丕又有《折杨柳行》叙游仙之事。曹植除了儒道之外,还可能受到佛教的影响。

这便形成了一种开放、综合的心态。开放,即不排斥任何学术文化的合理因素、创造精神;综合,即兼容并包,不将任何思想定为一尊,而让它们互相调节、臻于完善。在以曹操为代表的建安文人那里,各种思想调和一体、各得其所:立身济世上,有儒家的道德人格;调节身心上,有道家的艺术精神;治国御军上,有综核名实、赏罚必信的法术;还有其他学术思想以为补充。

其次,建安文人多有建功立业的理想。汉末名士以天下事为己任,如陈蕃“登车揽辔,有澄清天下之志”。然而这种雄心却因封建政治严酷的打击而无法施展。一直到黄巾起义,汉廷被迫取消禁锢,积极用世之心才在士人中再度兴起。曹操年轻时便表现出非凡的志气与才干。据《后汉书·党锢列传》记载:名士首领李膺

陈寿: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裴松之注,中华书局1959,第54页。

参见曹操诗《度关山》。

陈寿:《三国志·文帝纪》,中华书局1959,第77页。

之子李瓚位至东平相,他在临死前叹道:“天下英雄无过曹操。必归曹氏!”另一个名士何颙初见曹操时,就说:“汉家将亡,安天下者必此人也。”可知在当时,曹操已经被认为是汉末名士事业的继承者。“不戚年往,忧世不治”的精神,贯穿了曹操的整个一生。曹丕生于动乱之际,长在兵马戎旅之间,自幼便熟习弓马骑射,又纵览经史百家之言,当他被立为太子时,竟高兴地抱住丞相长史辛毗的颈项,问:“辛君知我喜不?”他虽然胸襟气度小于乃父,却常以古代的贤王明君自期。曹植的理想是“戮力上国,流惠下民,建永世之业,流金石之功”,而不屑于仅仅“以翰墨为勋绩,辞赋为君子”。作为建安七子冠冕的王粲,在《从军诗》中有“不能效沮溺,相随把锄犁”的自白,而陈琳“建功不及时,钟鼎何所铭”的诗句,则将这种壮怀吐露得更为明白直切。

其三,是通脱活泼、富于艺术情味的人生态度。

当经学独盛的时代,不仅学术的发展受到限制,文章辞赋成了经学的附庸,艺术尤被视为小道。经学的衰落,使文人能以轻松的态度对待人生,精神生活因之充实,而较富于艺术的情味。曹操“雅好诗书文籍,虽在军旅,手不释卷”,“御军三十余年,手不舍书,昼则讲武策,夜则思经传。登高必赋,及造新诗,被之管弦,皆成乐章”。他善音乐,才能技艺可与桓谭、蔡邕相比。又善围棋。他的书法笔力雄贍,《唐人书品》称“曹操书如金花钿落,遍地玲珑,荆玉分辉,瑶岩生灿”。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固然取决于曹操个人

陈寿:《三国志·辛毗传》裴松之注,中华书局1959,第699页。

曹植:《与杨德祖书》。

曹丕:《典论·自叙》,《三国志·文帝纪》裴松之注引,中华书局1959,第90页。

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裴松之注,中华书局1959,第54页。

转引自陈登原:《国史旧闻》卷十七。

的气识才具,亦与时代风尚相关联。

有关曹丕、曹植的两则轶事可以使我们想见当时文人通脱、活泼的生活风貌。一则见之于《世说新语·伤逝》:

王仲宣好驴鸣。既葬,文帝临其丧,顾语同游曰:“王好驴鸣,可各作一声以送之。”赴客皆一作驴鸣。

另一则见于《三国志·王粲传》裴注引《魏略》:

(曹)植初得(邯郸)淳,甚喜。延入坐,不先与谈。时天暑热,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,傅粉。遂科头拍袒,胡舞五椎锻,跳丸,击剑,诵俳优小说数千言。讫,谓淳曰:“邯郸生,何如耶?”于是乃更着衣帻,整仪容,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,品物区别之意。然后论羲皇以来,贤圣、名臣、烈士优劣之差,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,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。……淳归,对其所知叹植之材,谓之天人。

这些举动抒情别致而脱略礼法,精神豪爽而风度翩翩,散发着新的人性及人格解放的气息。它们发生在曹丕、曹植身上,颇能发人深思,耐人寻味。

### 三、建安文学的新风尚

新的学术思潮的变化造就了建安文人的新心态,使他们在感知世界、认识人生、从事创作时表现出与汉代文士明显的区别。刘

师培曾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的缘由及风貌,概括为四条:“两汉之世,户习七经,虽及子家,必缘经术。魏武治国,颇杂刑名。文体因之,渐趋清峻”,这是第一条;“建武(东汉光武帝年号)以还,士民秉礼。迨及建安,渐尚通悦。悦则侈陈哀乐,通则渐藻玄思”,这是第二条;“献帝之初,诸方棋峙。乘时之士,颇慕纵横。骋词之风,肇端于此”,这是第三条;“汉之灵帝,颇好俳词。下习其风,益尚华靡”,这是第四条。四条之中,前三条均与汉魏学术思潮有关。

这就造成了新的文学风尚。首先,建安文学对于时代的反映更直接、真切,文学的现实性增强了。汉末社会动荡,人民痛苦已极,现实的悲剧不断地刺激着文士的心目。在他们的笔下便记录了许多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:

铠甲生虮虱,万姓以死亡。

白骨露于野,千里无鸡鸣。

生民百遗一,念之断人肠。

——曹操《蒿里行》

洛阳何寂寞,宫室尽烧焚。

垣墙皆顿擗,荆棘上参天。

中野何萧条,千里无人烟。

……

——曹植《送应氏》

出门无所见,白骨蔽平原。

路有饥妇人,抱子弃草间。

顾闻号泣声,挥涕独不还。

未知身死处,何能两相完!

---

刘师培:《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》第三课,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,第 7 页。

——王粲《七哀诗》

卓众来东下,金甲耀日光。  
斩歼无子遗,尸骸相撑拒。

……

马边悬男头,马后载妇女。  
长驱西入关,迥路险且阻。

——蔡琰《悲愤诗》

至此,文学才冲破汉代经学的牢笼,走出宫廷,走向了社会。文学由润色宏业的工具转变为描写现实、抒发情志的手段,文人由倡优弄臣转变为时代的歌手,从而在传统的文学精神中注入了梗概多气的建安风骨。

同时,文学的抒情性也加强了。前人论建安文学,多言气质,如沈约说曹植、王粲“以气质为体”,刘勰论建安文学“慷慨以任气”,李善说“气质驰建安之体”。这里的“气”或“气质”,是指文人的主观精神。兵燹频仍、祸乱相结使建安士人充满了对现实的忧患,发而为要求变更现实、扫平世乱的昂扬志气。正如《文心雕龙·时序》所说:“自献帝播迁,文学蓬转,建安之末,区宇方辑……观其时文,雅好慷慨,良由世积乱离,并志深而笔长,故梗概而多气也。”

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建安文人主观精神的主流,那就是“慨当以慷,忧思难忘”。因时代动乱而忧思绵长,进而激发出慷慨的志意,所以建安诗文,多浸润悲壮之气。如以下的诗句:

瞻彼洛城郭,微子为哀伤。(曹操《薤露行》)

悲彼《东山》诗,悠悠使我哀。(曹操《苦寒行》)

忧从中来,不可断绝。(曹操《短歌行》)

君子多苦心,所愁不但一。(曹丕《善哉行》)

烈士多悲心,小人偷自闲。(曹植《杂诗》)

哀彼《东山》人，喟然感鹤鸣。（王粲《从军诗》）

悟彼《下泉》人，喟然伤心肝。（王粲《七哀诗》）

残酷的社会现实在文人心中引出深重的忧伤，使他们时而产生人生虚幻之感。然而更重要的，是激起他们心中平世乱、济苍生、立功业的壮志：

不戚年往，忧世不治。（曹操《秋胡行》）

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

（曹操《步出夏门行》）

在昔周武，爰暨公旦，载主南征，救民涂炭。……我独何人，能不靖乱。（曹丕《黎阳行》）

捐躯赴国难，视死忽如归。（曹植《白马篇》）

虽无铅刀用，庶及奋薄身！（王粲《从军诗》）

庶几及君在，立德垂功名！（陈琳《游览诗》）

这些诗句给人的感觉，不是气象衰飒、无可奈何的哀鸣，而是气宇沉雄的壮歌。它们是建安时代精神的体现。

对人情的体味与模拟是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。曹操在《却东西门行》中写战士的生活飘荡不定如同转蓬，“长与故根绝，万岁不相当”、“冉冉老将至，何时反故乡”，在《谣俗词》中模拟一个穷汉无力帮助朋友的心情。曹丕《燕歌行》拟思妇之情，《清河作》拟挽船士新婚别妻的心情。王粲《七哀诗》中拟饥妇弃子的语气及心情。这些，可能是受到汉人解说《诗经》的启发（汉人解《周南·卷耳》诸篇，多拟辞之说）。另一方面，也说明建安时代对于人情的重视增强了。

与建安士人开放、通脱的文化心态相一致，建安文学在艺术上呈现清新活泼的风姿。从语言上看，有两种倾向：一是尚华丽，二

是贵实用。刘师培《论文杂记》谈汉魏文章之变约有四端：汉人文章大抵单行之语，建安则易以排偶，“即非有韵之文，亦用偶文之体”，此其一；汉文言辞简直，句法贵短，魏代由简趋繁，有时用二语合成一意，此其二；汉文风尚古朴，魏文则多益之以声色，饰之以藻绘，此其三；汉人文辞古奥，不易明了，建安文章语意易明，无俟解释，此其四。总的倾向是趋于骈偶华丽，而不同的文体表现不同。大体上说：书檄之文则“骋词以张势”，论说之文逐渐趋于“校练名理”，奏疏之文“质直而屏华”，诗赋之文“益事华靡，多慷慨之音”。文体不同，呈现的艺术风貌也不尽一致。

建安诗歌在语言上走着骈偶化的道路，同时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着内蕴的意象美。试将西汉韦孟的《讽谏诗》《在邹诗》、东汉傅毅的《迪志诗》与曹操的《短歌行》《步出夏门行》稍作比较，便可感到它们不仅精神气质明显不同，诗歌意象的丰瘠腴枯亦判然有别。从总的方面看，解放了的文人灵魂对自然山水之美的感受大大地丰富了。道家思想的勃然兴起使得对于神仙境界的想象更完美、更具人情味了。《诗》《骚》中优美的情景描写带着新的意蕴回归了诗苑，从而造成了新的意象群，使建安文学呈现群芳璀璨、美不胜收的局面。

总之，汉魏之际学术思潮的转折给了建安文学以影响，推动了文学风气的转变，促成了它的繁荣。当然这种影响是间接的、潜移默化的。对于不同的作者，其程度及表现方式互异。从艺术风貌看，曹操悲壮古直，曹丕清绮绵长，曹植辞采华茂，七子所善，亦各有偏长。这些还涉及文学内部的以及社会人生的诸多因素，学术思想的影响不过是综合因素之一端罢了。

(本文原载《武汉大学学报》(社会科学版)1989年第6期)

刘师培：《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》第三课附录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，第32页。